

阿来与东坡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话

洪 树

看点 今年2月,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长篇非虚构新作《东坡在人间》出版,短短一个多月便入选“中国好书”2026年3月推荐书目,引发文坛与读者界的广泛关注。

在苏东坡研究已成一门显学的今天,在各类东坡传记、普及读物层出不穷的市场中,阿来为何还要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?这部作品又凭借什么脱颖而出?



《东坡在人间》并非一部完整的苏东坡传记。阿来将笔墨集中在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: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自儋州渡海北归,至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七月病逝于常州。这看似极窄的时间切口,却是一个极深的生命剖面。北归这

一年,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“重新审视过程”。他不是书写新的篇章,而是回顾宦海沉浮的得失,梳理与故人的恩怨关系,甚至在生命将尽时对那些曾经“插刀”的朋友报以宽恕。

66岁的阿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,循着东坡北归的路线,完成了跨越数千里的行走式写作,借助苏轼的书信、日记、唱酬作品及史书文献,还原其在生命最后一年的言行与思想。

这种“行走式写作”在传记文学中堪称独树一帜。大部分传记写作都是从文本到文本,而阿来用脚步丈量苏东坡走过的山路历程,在所有东坡传记中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。在儋州,他寻访东坡曾居住的“桄榔庵”,想象这位文豪在房漏三迁、缺食断粮的困境中自酿天门冬酒的淡然日常;在赣州,他驻足于东坡曾等候赣江水涨40余日的码头,体会他与昔日政敌刘安世冰释前嫌、共赴山间挖笋的豁达胸襟。这些实地踏访的细节不仅赋予了文本以鲜活的地理肌理,更让历史与当下在行走中完成了深度的时空对话。

全书在叙事上构建了双重时间线:一是东坡在元符三年启程北返至卒于常州的一年;二是阿来从2024年阳春到盛夏循迹而走的半年。两条线在书中不断交织、呼应、共振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结构。阿来在书中写道:“我要做的不是一个寻迹而至的人。不能伟大,但要靠近伟大;难以旷达,但要尽量阔大。”这种谦逊的追寻姿态,使得全书既是一部关于东坡的传记,也是一部关于“如何理解东坡”的思想札记,更是一部关于“作家如何向古人学习”的创作手记。

阿来对苏东坡的解读最具穿透力之处,在于他提炼出的“系与不系”的精神辩证法。所谓“系”,是入世担当——苏轼一生心系朝堂,即便屡遭贬谪,仍教当地人挖井、种田、治病,这份责任感他从未真正放下;所谓“不系”,则是超脱现实的智慧,

是他在风暴中锚定自我的精神缆绳。阿来由此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:东坡的旷达并非天赋,而是他在苦难面前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,是他在“系”与“不系”之间不断拉扯、挣扎、寻求平衡的结果。这种精神困境不仅是苏东坡个人的,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灵史。

正是在这一框架下,阿来对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所塑造的东坡形象作出了一些修正。在他看来,林语堂将苏东坡塑造成一个偏安于饮食与诗文间的“美食家”和“文学家”,却忽略了他最核心的身份——深度卷入变法与反变法浪潮的政治家。阿来多次强调:“理解东坡,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艺术、生活方式的层面,而要对他置身身的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,只有这样,才能对东坡的人生沉浮和思想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。”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轼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,到晚年认识到部分变法合理性的思想转变过程,指出苏轼之所以不会固执己见,全在于他“爱这个国家以及爱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”。

对于时下流行的“吃货东坡”“反焦虑达人”等扁平化标签,阿来在书中也以翔实的史料指出:苏轼在顺利做官的时候,没有留下一个字说吃的事情;只有在贬谪黄州时,他才研究怎么做猪肉,在儋州则是因买不起整羊肉而吃羊蝎子。这种在极端贫困中寻找生活乐趣的行为,恰恰体现了苏轼“不放弃任何一点寻找乐趣的机会”的达观精神,而非后世过度浪漫化解读中的“天生乐观派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东坡在人间》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也做了可贵的努力。阿来坚持立足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真实的人生遭遇,去揣摩历史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心理变化。他认为,苏轼的诗词文章从来都是对现实的反映、对民生的关切、对人生的思考,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潇洒。这种学术品格,使《东坡在人间》在众多东坡题材读物中脱颖而出,呈现出一种既有历史厚重

感又有当下温度的独特气质。

在文体上,《东坡在人间》难以被简单归类。它不是传统的传记,不是纯粹的游记,不是学术论著,也不是散文随笔——它将这些文体的优长熔于一炉,形成了一种“混成式”的非虚构叙事。阿来将实地调研视为阅读的一种形式,这种探索呈现为现实场景与历史场景相互穿插的叙事结构,让苏轼的形象越发丰满立体。

这种叙事张力在书中随处可见。在赣江十八滩前,面对湍急奔涌的江水,阿来瞬间体会到“十八滩头一叶身”诗句背后深切的孤独与艰辛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仅靠文字记载难以体会其中心境,唯有站在赣江险滩前,才能真正读懂诗句背后的艰辛。”这些行走中的体悟,不是对史料的复述,而是作家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古人的生命经验发生的直接碰撞。

阿来以苏东坡穿越半个中国的行程为线索,串联起他宦海沉浮之后尚羁縻于心的为官、为人、为文的人生片段,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东坡,还有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苏东坡,以及“点点是离人泪”的苏东坡——这才是一个完整的、可感可触的苏东坡。

阿来的文字风格在书中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他兼具博物学家的观察力与诗人的感受力,既能在历史细节的考辨中保持学术的严谨,又能在行走的感悟中流露诗意的温情。书中手绘的“东坡北归行迹图”,清晰标注了跨越千里的生命旅程,成为独特的视觉符号。此外,两个“66岁”的暗合也为本书增添了一种难以复制的生命共鸣——东坡北返已过花甲之年,阿来写东坡时也在相同的年纪。阿来在书的后记中说:“我能感到他心底里万丈波澜,笔底下无限江山。”这种同龄文人之间的共情,是任何案头研究都无法替代的。

阿来通过苏东坡这个千年文化符号,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与精神共鸣。

书里书外的文化记忆

范 军

不久前,收到上海一位朋友寄来的新书《书里书外》(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2月版)。这书内容充实、史料丰富、装帧精美的图书,是上海韬奋纪念馆所编的“三联书店往事”丛书的最后一册。前两本《书店灯光》《甘苦同志》分别围绕三联书店曾经的书店网络,以及“老三联人”这支队伍辑成。这本则将目光指向书店业务,探寻三联书店往事的实务根基。“书里”部分,讲述的是出版物生命史;“书外”部分,讲述的是邮购、通信、门市、油印等各部门的工作呈现出的书店日常运转。

所谓三联书店(以北京为核心)是由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家进步书店——生活书店、读书生活出版社、新知书店——合并而来。三家书店皆以办杂志起家,生活书店创办了当时

发行量创纪录的《生活》周刊,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了《读书生活》,新知书店则创办了《中国农村》。由杂志社而成综合性出版机构之后,三家书店先后出版了第一版中文全译本《资本论》,以及“青年自学丛书”“创作文库”“社会常识读本”“国际现势丛书”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丛书。诚如《编者》中所说:“这类关于出版物生命史的讲述,组成了本书的‘书里’视界。”

无论“书里”还是“书外”的故事,都是“老三联人”的集体记忆,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。其间,有练习生还原半个世纪前的招考、训练和生活细节,有书店与读者朋友的种种往事,有普通油印工的成长履历等,无不生动而具体,又带有那个时代的、那个集体的共同印记。在我看来,“老三联人”是一个“记忆的共同体”。诚如西

方学者所说的,虽然集体不能“拥有”记忆,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,即是最私人的回忆,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。三联书店当年是进步文化的共同体、革命事业的共同体,如今又是情感共同体、记忆共同体。正因为有他们自觉的交流与互动,有相关联谊活动的开展,有《联谊通讯》的编印,才积累下真切难忘、鲜活丰富的历史资料。回忆也是一种重构,一种再生。“老三联人”讲述的“书里书外”的精彩故事,不仅是回望过往,也是观照当下,更是指向未来的。在《编者》中,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‘书里’与‘书外’的往事交错互构,使我们得以走进‘老三联人’过去工作与生活的一个立体世界,从细微处再考察三联书店乃至进步出版业的过去。而当出版和发行在当代面临新的

挑战,这些过去的经验能否启迪当代的后来者?”编者没有直接回答,但答案就在《书里书外》的字里行间了。该书的封底有几行字可说是编者的夫子自道:书籍是一种有思想的文化产品,经营书店虽然也是做生意,终究不同于卖青菜萝卜和家用电器。用韬奋先生当年的话说,我们“共同努力是进步文化的文化事业”,“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,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”。

三联的品格、三联的精神,尤其是韬奋精神,韬奋倡导的服务精神等,已经且仍在深刻影响着当今的出版人、出版界。即便从纯历史研究的角度看,这本《书里书外》,还有另外两本“三联书店往事”,也为我们拓展、丰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。

晚明知识人:走出庙堂的斯文

陈华筠

提示 明代读书人是什么样?是致仕归隐却心系天下的“乡先生”,还是臧否清谈却在朋党倾轧中进退失据的士大夫?这些刻板印象,在陈宝良《斯文在兹:明代知识人画像》中有了全面而有力的廓清。本书以宏阔的史观、生动的笔触,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中华“知识图景”的重要画卷。



本书可谓是陈宝良近40年学术积累的精心结撰。他以“斯文”嬗变为线索,将目光从朝堂、书院投向市井、作坊,从而重塑了我们对明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固化认知。全书在历史思辨与细腻描摹之间找到了恰切的平衡点,既是一部严谨的断代社会史研究力作,也是一册供读者细细品读的晚明人物志。

本书创新性地将明代从“士大夫社会”走向“知识人社会”的关键断制。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,“斯文”仿佛是垄断在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手中的“道统”特权。陈宝良指出,明代中期以降,斯文传承的担当者进一步泛化,不再局限于儒家学者,知识权力向掌握各类专业技能的群体分散。在书中,一个多元、生动且充满活力的“知识人”生态场域,被分为了八种典型的切片加以解剖:一是致仕归乡、教化桑梓的“乡先生”;二是严苛砥砺、践行理学教条的“道学先生”;三是借诗酒文章抒发性灵的“骚人墨客”;四是好名邀誉、疏离官场的风流“名士”;五是亦儒亦儒、贾而好儒的“商士”;六是游心于物、格物致知的“工匠”;七是悬壶济世、医儒合流的“儒医”;八是深锁闺中却才情绝代的女性知识人。通过这些身份各异的“画像”,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,在晚明,“知识”不仅仅意味着四书五经,它已经拓展至百工技艺、经商理财等广阔领域。文化权力不再是少数庙堂之士的禁脔,而是一点点浸润到了

民间与专业领域。

第五章对“商士”的描绘,堪称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。在传统的偏见里,商人往往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,然而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表明,晚明出现了大规模的“弃儒从商”与“商而好儒”现象。这些“商贾知识人”不仅具备雄厚的财力,更在经商的云游中积累了深厚的地理、算术与世俗之知。他们崇儒好文,不仅重塑了自身的阶层形象,更通过刊刻书籍等方式,构成了推动晚明文化繁荣的一支重要经济与社会力量。

陈宝良并未满足于罗列八类知识人的形象,而是透过群像的缝隙,洞见了明季文化体系的整体性转型帷幕的徐徐拉开。当理学家在书院建构庞大的道德心学体系时,中晚明的街头巷尾,日用民生之道正在悄然兴起,成为另一种更加生动活泼的学问。与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路径不同,明代很多知识的进步并非源自贵族空想或纯学院派的推导,而是由工匠在“游于艺”的长期实践中触类旁通,或由医生在对症下药的临床中破旧立新。这种从“形而上”之思向“形而下”之术的转移,让整个社会的知识基座变得更加厚重、务实而多元。这些由“术”见“道”的普通人,正是被正史遗忘的幕后推动者,而陈宝良将他们郑重地请回了历史的前台。

在本书的描述中,“斯文”不再是皇帝特许或科举认证的特权体系。当一位名医

通过医术获得跨越阶级的社会声望,当一位布衣文人通过出版书籍引领一时的风尚,“道统”便悄然发生了移位。代表民间的、鲜活的“文化权力”,开始与僵化的行政权力构成一种并行甚至对峙的奇妙格局。这恰恰是晚明社会“活力”与“多样性”的根源之一,也是理学禁錮之下依然能开出个性解放、思想争鸣花朵的底层密码。

陈宝良素来以扎实的史料功底见长,在本书中,他展现出了同样的风范,同时又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拓新意识。他既从官方正史里构架筋骨,又从从不厌弃散落在明人笔记、日记乃至小说中的血肉细节。这种“全景与切片”并置的手法,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,又超越了碎片化的世俗猎奇。

全书文字洗练却饱含趣味,不故弄玄虚,不以艰涩文饰浅陋。如写商贾之勤勉、医家之济世、名士之落寞,往往只消数字,便让一位湮没于故纸堆中的古人形象呼之欲出,颇得明代小品文与笔记小说的白描神韵。这种史笔,使人读来不觉枯燥,反而有一种读《世说新语》般随时有发现的乐趣。

陈宝良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批最早具备“现代”雏形的知识灵魂。他们告诉我们,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,“读书人”不仅是坐而论道的旁观者,也是以行走、制造、经商、行医乃至恋爱、吟唱来介入世界的主体。

读到

母爱是岁月道不尽的深情

姚雪痕

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,母爱是一个永恒的书写主题。

文学大家的笔下,从不乏形形色色的母亲形象,老舍、胡适、鲁迅、莫言……他们笔下的母亲,或隐忍坚韧,诠释中国传统女性的坚强与慈祥;或敦厚善良,尽显底层人物的质朴与纯粹;或温和开明,彰显东方母亲的通透与智慧。

在孙宇的漫画绘本《来一斤母爱 十年之约》和梁晓声散文集《致母亲》中,我遇见这样两位母亲:一位在短暂的生命中倾尽心血,让我们懂得母爱之珍贵;一位在贫寒中顽强支撑,让我们看见母爱之光亮。不同的母爱,同一种情深,在文字里交织成人间最温情的动人诗篇。

“一斤母爱”源自孙宇与母亲的一句玩笑话,此后母子俩的日常对话中,每每以此作为调侃。

2011年,母亲因肺癌去世。10年后,孙宇用172页手绘图和文字创作出《来一斤母爱 十年之约》,向远在天的母亲深情告白:母爱如此平常,平常到我们视而不见;母爱又如此短暂,短到来不及说一句谢谢。年少时,我们总以为母爱天经地义,总以为唠叨烦人、约束多余,总以为来日方长、岁月悠长,却不知道母爱最经不起等待,最扛不住遗忘。直到失去之后,我们才猛然惊醒:那些被忽略的日常,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怀,正是生命最珍贵的光芒。

“来一斤母爱”,是孩子的天真话,却藏着深刻的人生隐喻:母爱不能称量、不能购买、不能重来。有些陪伴很短,却足以铭刻一生,一旦失去,就是永远。梁晓声笔下的母亲,是从贫穷、重压、苦难中生长出来的强者。她身处社会底层,目不识丁,却有着超越常人的远见;她正直善良,靠做翻砂工、缝绗工撑起全家人的生活;她从不讲大道理,却用行动教育子女明辨是非;她鼓励孩子学习文化,坚信知识改变命运。

在《慈母情深》一文中,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少年梁晓声想买一本《青年近卫军》,一元多的价格却让他望而却步。因为家里已经很拮据,以至于那个破旧的收音机都被变卖吃进了肚子里。终于有一天,他鼓起勇气向母亲讨要了一元五角钱。然而,想到闷热嘈杂的缝绗车间里母亲尚佝偻疲惫的劳作模样,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应该长大了。于是,这一元五角钱又成了送给母亲的水果罐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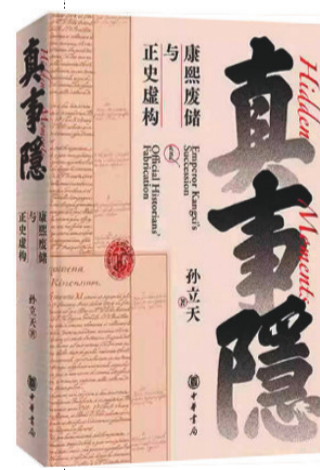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故事里,母亲对儿子是疼爱与成全,儿子对母亲则是愧疚与感恩。母子之间相依为命、互相体谅,折射的是贫苦岁月里淳朴深沉的亲情。

两本书,两位母亲,两种境遇,抵达的是同样的母爱高度。孙宇笔下的母亲,在病痛中把温柔和坚强留给孩子,教会他珍惜;梁晓声笔下的母亲,在贫寒中把光亮和希望留给孩子,教会他担当。

母爱不是符号,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纯粹的托举,是一种存在对另一种存在最倾心的守护。它藏在粥一饭的关切中,藏在一言一语的叮咛里,平凡却温暖人心。今天,让我们阅读致敬母亲,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岁月不染风霜,辛劳皆有回甘。半生为儿女操劳,往后只享清静,平安健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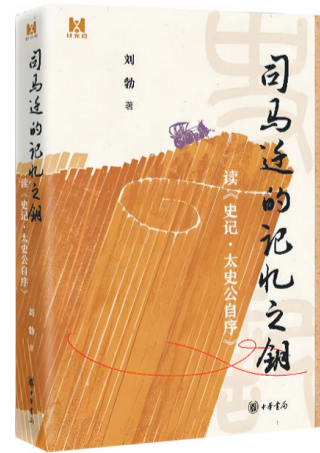
荐书

于字页沉光处洞见历史真相



《真事隐: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
中华书局

正史一定是真实的吗?帝制时代的正史常被权力操控,未必能还原历史真相,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康熙废储事件。作者依托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《北京纪事》,揭开了这段被正史掩盖的细节,让我们看清权力如何扭曲历史,也让本书成为探寻历史真相的绝佳读本。



《司马迁的记忆之钥:读〈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〉》
中华书局

何谓史家坚守的初心与真相担当?本书以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为线索,拆解司马迁的著史心路。他从不刻意美化帝王,不避讳权贵过失,以笔墨冲破世俗禁锢与政治压力,执着记录真实史事。读这本书,方知司马迁忍辱著史,以生命守护历史本真的崇高品格。



《历史缝隙里的人》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历史的真相不仅仅只藏在帝王将相的故事里。穆齐贤本是道光年间一个六品小官,遭悍亲王锡绶无故囚禁长达16年。他的妻子不畏强权,冒死鸣冤,最终震动朝野,解救众多蒙冤之人。本书打捞被正史忽略的边角人物,展现了小人物在强权面前为尊严和自由而抗争的勇气。